

从“经济理性” “生态理性” 到 “生态经济理性”：生态现代化的理性转向

张月镒，和文静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1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14日

摘 要

西方生态现代化试图以“生态理性”来调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张力，但受资本逐利本性的制约，其“生态理性”实质仍属“经济理性”范畴。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展开了系统批判，但存在理性对立的偏颇与实践转化的困境。相较而言，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在辩证否定前两种理性的基础上，生成“生态经济理性”，以“更高更优更美”作为价值取向，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在更高层次的有机统一。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尝试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提供一种哲学层面的理性建构。文章通过对西方主流生态现代化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两种重要思潮的比较与批判，为阐述中国方案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建立了重要参照系。

关键词

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生态经济理性，生态现代化

From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to “Ecological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 Rational Shif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Yuerong Zhang, Wenjing He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August 1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5,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4, 2026

文章引用: 张月镒, 和文静. 从“经济理性” “生态理性”到“生态经济理性”: 生态现代化的理性转向[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5): 1292-1298. DOI: 10.12677/isl.2026.105152

Abstract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seeks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ecological rationality”, yet, being constrained by capital’s inherent drive for profit, its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ssence remains subsumed under “economic rationality”. Ecological Marxism, in turn, offers a systematic critique of capitalist “economic rationality” but is hampered by a one-sided opposition between rationalities and difficulties i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By contrast, Chinese-sty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draw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of socialism, dialectically negates both of the preceding rationalities and generates an “eco-economic rationality”, with “higher, more optimal, and more beautiful”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so as to realize a superior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offer a philosophical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critique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ecological Marxism,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crucial reference system for articulating the distinctiveness and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model.

Keywords

Economic Rationality, Ecological Rationality, Ecological Economic Rationality,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是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议题。西方现代化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社会危机。为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生态问题，西方出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福斯特、高兹为代表，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反生态进行了系统批判，并提出“生态理性”作为替代方案。但因资本逐利本性的深度嵌入，西方生态现代化终未摆脱“经济理性”的桎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成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生态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中国既没有简单重复“经济理性”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路，也没有照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的以生态抑制发展的新路，而是在批判吸收二者的基础上，以“更高更优”代替“越多越好”，以“更优更美”代替“少而好”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理性”。

2. 西方生态现代化“生态理性”的实质及资本逻辑下的“经济理性”

20 世纪 80 年代，面对日益深化的现代性生态问题，西方学者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然而，深入考察其演进历程各阶段的理性取向与内在逻辑便会发现：尽管对“生态理性”做出了明确而系统的理论阐发，但因未能突破资本逻辑，仍属于“经济理性”范畴。

2.1. 解放生态与复归“生态理性”的理论构想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是为调和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的矛盾，应对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退化

问题,使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相包容,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协调发展。

针对解放生态与复归“生态理性”的问题,西方学者通过引入“生态”理念,将生态嵌入现代化体系,以此促进生态化与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从而让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独立地位,重建“生态理性”的主导地位。第一,将生态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开,确立其独立于经济活动并与之对等的地位;第二,谋求“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在经济活动中兼顾生态友好,确保二者并行不悖;第三,以“生态理性”为边界,约束好其他理性(经济、政治、科技)的作用范围。因此,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生态理性”与其他理性彼此独立而又兼顾并行,它不排斥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而是力图成为与经济、政治携手前进的一方。

2.2. 资本逐利本性下“生态理性”复归的实践困境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西方生态现代化做出许多调适,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较为典型。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通过为不同地区或企业定制不同的排放标准,内化环境成本,但政策严格性弱,碳排放量仍较高;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倾向于制定统一标准,政策严格性强,实现了更低的碳排放水平。莱茵河治理是欧洲大陆模式的成功典范,通过建立跨国的“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实现了高效的协调治理。

简尼克强调,只要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形成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化解生态危机^[1]。但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续,资本逐利便不会停止运行,“生态理性”难以真正彰显。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既无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无心谋求制度层面的实质性变革,仅寄希望于技术创新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杰文斯悖论”揭示了技术的局限,即提高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并没有带来资源的节省,反而刺激需求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造成“绝对数量”的资源消耗。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理论上高扬“生态理性”,在实践中却依旧遵循“经济理性”,由此加速了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激化了人与自然的深层矛盾,使生态危机持续蔓延。在面对经济友好还是环境友好的分叉路口时,有更利于生态环境但成本更高的处理方式,却亦然选择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低成本处理方式,即是资本逐利性的典型映照。这不仅显示出西方生态治理体系的无力,更使其所标榜的“生态理性”失去了实质性说服力。

2.3. 资本逐利本性下的“生态理性”实则是另一种“经济理性”

内嵌于资本运行的“经济理性”,以“越多越好”的无限增长为本性,必然激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生态危机。西方现代化在资本主导下始终为“经济理性”所支配,其服务资本逐利、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宗旨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均无实质性改变。

“西方生态现代化力图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在生态文明的社会新形态中的平衡。”^[2]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被资本裹挟,技术发展的方向并不服务于“生态理性”,反而在反生态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优势与技术优势,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以他国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本国环境改善。“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资本积累,内在地要求生态剥削与压迫。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协调效益既不普惠,又通过产业转型将失业与能源上涨的代价转嫁给低收入群体。归根结底,这种以利益至上、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本位的现代化,漠视生态正义、纵容生态掠夺,绝非全球生态现代化的正途。

因此,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通过“生态”的再植入恢复“生态理性”,但因其受限于资本逐利本性,回避制度变革,最终未能摆脱“经济理性”的支配。所谓的“生态理性”也不过是“经济理性”的变体。这表明,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的社会与制度重构,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与现代化的和谐共生。

3. 生态马克思主义下“生态理性”的两面性

福斯特、高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西方生态现代化“生态理性”名实相悖的基础上, 系统阐发了“生态理性”的理论内涵与框架。高兹认为: “不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和通过约束自我来减少消费, 就不可能有生态现代化。” [3]。

3.1. 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经济理性”的批判性解读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对奉行“经济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展开透彻分析。高兹便是其中一员。他认为, “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 是一种以冰冷数字衡量不可衡量之物, 并一味追求“越多越好”。

西方生态现代化承续了现代性危机, 仍以“经济理性”作为支撑, 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 西方生态现代化实质上是对环境问题作出的内部调适, 并未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 也避免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质性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变, 生态现代化所倚仗的理性只能是“经济理性”, 但该理性兼顾不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另一方面, 在资本主义制度固化的情况下, 西方生态现代化充斥着“经济理性”的思维定式, 醉心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利润驱使下, 生产者、销售者等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利润, 导致“进入生产过程的工人将被剥夺他们的人格和个性、他们个人的目的和欲望” [3]。高兹由此断言, 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与环境保护根本对立, 其利润动机必然引致对绿水青山的破坏。

3.2. 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取向

“经济理性”以“越多越好”为信条, 却无视“多”未必“好”的基本事实。凭借消费刺激与需求扩张追求资本增殖, 它在创造“金山银山”的同时毁灭了“绿水青山”, 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随之加剧。相反, “生态理性”则倡导“更少地劳动, 更好地生活”。

福斯特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概念出发, 强调资本主义大工业对自然循环的物理性破坏, 主张通过社会所有权和计划性生产修复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变换。奥康纳提出“第二重矛盾”来揭示资本积累对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破坏, 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和社会运动调节生态分配正义。高兹则聚焦于劳动分工、技术选择与消费异化, 将“生态理性”锚定在自主生产、小规模技术和消费节制上。高兹所阐释的“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是对“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的直接回应。其中, “更少”意指减少劳动投入与资源消耗, 减少生产生活领域的物质损耗, 降低对自然的影响。“更好”则意指提升产品的使用性能和耐用程度, 生态环境质量更好, 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产条件更好, 最终体现为社会整体的进步。高兹据此主张, “生态理性”的指引可以使“更少生产”通向“更好生活”。

3.3. 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的两面性

高兹“沿着马克思的思路” [4], 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之危害的基础上, 提出了“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替代方案。然而, “生态理性”在彰显积极意义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消极的一面。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理性”的探讨, 其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 “生态理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化理论对话的理论产物, 虽仅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念, 却始终以破解生态困境为根本指向, 为审视环境问题与现代性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第二, “生态理性”以“更少但更好”的价值取向纠正“越多越好”的偏颇, 它关注人的真实需要, 关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幸福体验, 重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实际影响。最后, 高兹认为“生态理性”就是“社会主义的以保护生态为根本宗旨的理性” [4], 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具备有效化解生态危机的能力。然而, 生态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理性”的理论建构并非尽善尽美,其局限性与偏颇之处同样值得审慎审视。第一,在理性关系的认知上缺乏辩证眼光。经济无法脱离生态一意孤行,生态也同样离不开经济作为支撑。“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相依赖。高兹在论述真正的社会主义时,甚至明确主张摒弃“经济理性”,以价值理性取而代之,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忽略了理论间的辩证关系。第二,“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在实践层面缺乏可行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性”虽在学理层面为审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但由于脱离了经济体系的现实支撑、与“经济理性”隔离,始终难以从理论构想转化为有效的实践力量,因而未能真正破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困局。“运用生态理性规范经济理性,限制经济理性的辐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发展”[5],脱离“经济理性”支撑的“生态理性”,因缺乏制度载体与实践转化机制而难免沦为乌托邦构想。由此可见,在二者之间建立辩证融合的通道,仍是亟待破解的理论命题。

4.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发展特征及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6]。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经济发展也要生态保护,这一系列本质规定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升华为统合“更高更优更美”的“生态经济理性”,是“生态约束下的经济理性”,也是“经济效率支撑的生态理性”,它将生态法则内化为经济决策的“前置程序”和“内在成本”。

4.1. 以“更高更优”取代“越多越好”:对“经济理性”的超越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以人民主体地位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坐标,其所生成的“生态经济理性”必然超越西方为资本服务、利润至上的“经济理性”。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内在统一,关键在于打破以资本逐利为中心的生态现代化路径,在借鉴西方经验中克服其缺陷。西方生态现代化若回避制度变革,便与西方传统现代化无异,仍将沿袭“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而资本逐利与“经济理性”恰恰是生态危机与现代化危机的共同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三者深度关联。马克思曾指出,西方现代化“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7]。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化解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从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的“经济理性”。“生态经济理性”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调参与。不同于西方“经济理性”以资本所有者为核心决策者,“生态经济理性”将人民群众置于决策的中心,通过制度化渠道保障公众在生态环境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政府承担生态红线的制定者与底线守护者角色,市场在绿色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中发挥效率优势,社会组织和公众则构成生态诉求的表达机制与监督力量。三者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监督”的协同治理结构,实现从“越多越好”转向“更高更优”。“更高”指向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更优”指向产品品质的改进与产出效益的增强,二者共同构成其核心内涵,内在地扬弃了“经济理性”单纯追求数量扩张的偏狭。

4.2. 以“更高更优更美”取代“更少但更好”:对“生态理性”的扬弃

“生态理性”不应简单排斥“经济理性”,而应坚持对“经济理性”的扬弃。“生态理性”虽与“经济理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纠正,但难以从根本上破解生态困局,也难以有效消解现代性生态危机。

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化解生态危机为指向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在主体归属上区别于西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作为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建设者和建设成果的享有者。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多维协同推进的“并联式”现代化,其目标指向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其内在规

定性要求服务于广大人民, 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尤其是对优美生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要求遵循“生态阈值优先下的效益最优化”原则。任何经济决策首先通过生态承载力评估, 即自然资源的消耗不得突破生态系统的再生阈值, 污染物的排放不得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但既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 也不能以抑制发展为代价维持生态良好, 而是既要弘扬“生态理性”保护自然, 也要扬弃“经济理性”推动发展。高兹所倡导的“更少”方案, 与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并不吻合。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 是在更高效率的投入产出、更优质的产品服务供给、更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之间实现多维度协同提升。

4.3. “更高更优更美”: 在辩证否定中生成的“生态经济理性”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生态经济理性”是“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出的更为高级的实践理性, 是伴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呈现着的新型理性”[8]。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在结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生成的。

通过对“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辩证整合,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孕育出“生态经济理性”这一全新理念, 其核心在于实现生产的高效化、产品的优质化以及生活的美好化。“生态经济理性”并非简单折中, 而是批判地吸收二者的积极成分: 一方面, “经济理性”能够激发人的主体能动性, 提高生产力, 为经济繁荣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 “生态理性”强化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自觉关怀, 为应对生态困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价值导向。“生态经济理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辩证否定, 并建构多维度的绩效评估体系, 传统的 GDP 增长率为单一核心指标被扬弃, 代之以涵盖经济发展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质量及人民生态福祉的综合评价框架, 将“更高更优更美”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可测度、可比较、可考核的具体变量。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性建构遵循了辩证否定逻辑, 从“经济理性”、“生态理性”上升到“生态经济理性”, 价值取向从“越多越好”、“更少但更好”递进至“更高更优更美”。这一新型理性秉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9]原则, 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对自然最轻微的影响进行生产生活, 并以人民福祉为依归, 将优美环境视为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生态经济理性”与“生态经济学”“循环经济”在理论指向和功能定位上存在本质区别。“生态经济学”提供了生态约束下的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工具, “循环经济”提供了如何实现减量增效的技术路径, “生态经济理性”则从价值本源上重构了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基础, 将“人们生态福祉”确立为经济发展的终极依归。

5. 结语

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驱动下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 亦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上高扬“生态理性”, 却固守资本主义制度, 所以未能挣脱“经济理性”牢笼。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反生态本质, 提出“更少但更好”的替代方案, 批判深刻且富于启迪, 但其非此即彼的理性对立观, 因缺乏制度依托最终难以摆脱乌托邦色彩。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在批判吸收两种理性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的“生态经济理性”。既超越了“经济理性”只顾经济发展的短视, 也扬弃了“生态理性”抑制发展求保护的偏向, 实现了从“越多越好”、“更少但更好”到“更高更优更美”的跃迁。可见, 能否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内在统一, 关键在于坚持何种制度逻辑与价值立场。“经济理性”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逐利本性; “生态理性”难以独立发挥作用的症结是缺乏足以支撑其运行的制度基础。“生态经济理性”的根本保障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赋予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 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生态保护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探索, 不仅为破解本国生态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 也为人类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 2026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高兹劳动解放思想的生态向度研究》(YJSJJ26-B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黄英娜, 叶平. 20 世纪末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述评[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4): 2-9.
- [2] 郝栋. 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解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9(7): 111-116.
- [3] Gorz, A. (1994)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Press, 34, 20.
- [4] 陈学明, 张双利, 马佣军, 等. 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82, 585.
- [5] 刘歆.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及当代启迪[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137-144.
- [6] 张云飞.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导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1): 11-18.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49.
- [8] 刘晓青, 张海燕.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的本质与价值[J]. 新视野, 2021(5): 72-76.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927.